



A Study on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from Implicitness to Explicitness

—Mental Space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Idioms in Mo Yan’s Novels

Yue Shen, Zhenqiang Zhao

School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China
Email: sy0416sy@163.com

How to cite this paper: Shen, Y. and Zhao, Z.Q. (2026) A Study on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from Implicitness to Explicitness.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13: e14969.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14969>

Received: February 1, 2026
Accepted: February 28, 2026
Published: March 3, 2026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Open Access Library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Abstract

Based on the Mental Space Mapping theory from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involved in translating Chinese idioms into English in Mo Yan’s novels.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pervasive implicit agentive and patientive meaning in the semantic construal of Chinese idioms, and examines how these are explicated in cross-linguistic transfer through mental-space operations of mapping, integration, and elaboration.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Owing to their strong spatiality, paratactic features, and holistic mode of thinking, Chinese idioms frequently contain implicit agent and patient elements in the source domain or input spaces; 2) Explication strategi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display a continuum distribution, with specific methods including supplying implicit agentive/patientive meaning, making implicit passive semantics explicit, and adding conjunctions or verbal elements to complete the syntactic framework; 3) The degree of explication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idiom type, cultural load, and narrative context, with translators dynamically balancing the retention of “heterogeneity” and reader acceptability to accomplish the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from implicitness to explicitness.

Subject Areas

Linguistics

Keywords

Chinese-English Idioms, Cognitive Mechanisms, Mental Space, Semantic Explication, Implicit Agent/Patient

1. 引言

习语作为语言与文化的结晶，其翻译一直是文学译介与文化传播的核心难题。汉语习语，尤其是成语、惯用语、俗语、谚语及歇后语，承载着深厚的民族认知模式与文化内涵，其语义建构过程往往隐含着独特的认知机制。在汉英翻译中，这些隐含的认知元素如何被识别、处理并重构于目标语，是一个涉及深层认知转换的复杂过程。莫言的小说以其浓郁的地域色彩、丰富的民间语言和大量的习语运用，为观察这一过程提供了绝佳的语料。其作品经葛浩文译介后在国际文坛获得巨大成功，其习语翻译策略已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案例。现有研究多从归化/异化策略、文化负载词处理等宏观层面展开，少有研究深入剖析翻译过程中微观的、动态的认知操作，特别是汉语习语语义结构中所特有的潜隐元素在跨语言心理空间映射中如何被激活与显化。鉴于此，本文依托认知语言学的心理空间映射理论，通过对莫言小说葛译本中习语翻译的实证分析，揭示从“潜隐”到“显化”这一认知转换的内在机制与规律。

2. 研究现状

汉语习语的翻译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早期研究多关注翻译方法与策略的分类与评价，如直译、意译、套译、省译等。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基于平行语料库的习语翻译研究逐渐增多，为译者风格与策略倾向提供了数据支撑。单伟龙(2017)以《红高粱家族》和《变》的语料库为基础进行分析，认为葛浩文在习语翻译上总体偏向直译策略，并优先采用异化处理，同时多种方法补充使用[1]。朱琳与马莉(2024)对《生死疲劳》英译本的研究进一步量化了葛浩文“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倾向，发现习语显著倾向采用异化策略[2]。这些研究为把握译者宏观策略提供了实证基础。

在理论视角上，学者们开始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习语翻译。陈建彬(2020)从互动体验、范畴化、概念隐喻等五种认知方式综合探讨了汉英习语语义形成的认知机制，指出习语语义形成不是任意性的，而是有理据和动因的[3]。黄曼与廖美珍(2020)聚焦习语变异构式的理据建构，提出“隐喻-转喻连续统”的分析框架，发现汉语习语变体多呈现一种类型的互动关系[4]。战海英(2025)的研究具有直接启发性，其以心理空间映射理论为依托，对英汉习语的语义认知机制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明确指出汉语习语的始源域或输入空间中常存在隐性元素，包括隐性施动者、隐性被动语义及隐性动词/连词元素，而英语习语中通常不存在此类隐性元素[5]。这一发现为本研究聚焦“潜隐”元素的翻译转换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切入点。

关于莫言小说语言特质及其翻译的研究也颇为可观。吴爱荣与菲丽娜·米吉提(2019)分析了莫言小说中成语的特殊用法及俄译障碍，提出了忠实连贯、修辞性适当传达、引申义优先等翻译原则[6]。宋庆伟(2019)从话语建构角度分析了葛浩文译本如何通过以异化为主的策略解构西方强势话语，彰显中国文学特色[7]。欧阳珊(2023)从跨文化视角探讨了葛浩文四字成语英译策略，指出译者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选用特定翻译策略，能够较为有效地传达中国四字成

语的意义[8]。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莫言作品翻译的复杂性。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将习语视为一个整体单位进行策略归类，或从静态对比角度分析差异，较少动态追踪翻译过程中译者心智对习语内部隐性认知元素的在线处理。特别是对汉语习语中因意合、空间性特质而产生的潜隐施事、受事等语义角色，在英译时被迫显化的认知动因与操作路径，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与语料验证。因此，整合心理空间理论，利用莫言小说丰富的双语习语对，深入剖析这一从潜隐到显化的微观认知转换过程，不仅能够深化对汉英习语本质差异的理解，也能为文学翻译的认知研究提供新的案例与见解。

3. 理论、问题与方法

本部分围绕“从潜隐到显化”这一核心命题搭建认知分析体系，将从理论基础、研究设问和实证路径三个维度依次展开，为后续语料分析与机制阐释提供概念工具、问题导向和方法保障。

3.1. 理论框架

本研究以 Fauconnier & Turner (2002)提出的心理空间映射理论为核心框架[9]。该理论认为，意义建构是说话者建立相互联系的心理空间网络并进行认知操作的过程。关键步骤涵盖构建心理空间、开展跨空间映射、选择性投射到整合空间，并通过组合、完善和细化产生层创结构。在翻译语境下，原文文本激活译者心智中的一个输入空间(源语心理空间)，其语义结构包含显性语言符号及其激活的隐性认知元素(如潜隐的施事、受事、动作、关系)。译者需在目标语文化的语言认知框架下构建另一个输入空间(译语心理空间)，并通过跨空间映射，将源语空间中的关键关系(包括隐性的)有选择地投射至整合空间，最终通过完善和细化，生成符合目标语规范且尽量忠实于原文认知内容的译文。

战海英(2025)的研究指出，汉语习语因其认知机制特点，常在输入空间中包含隐性元素[5]。本文将这一观点具体化，聚焦于两类关键的隐性语义角色：潜隐施事义(implicit agent)与潜隐受事义(implicit patient)。潜隐施事义指在习语表层结构中缺失或被背景化，但理解其语义必须被激活的动作发出者；潜隐受事义则指缺失的、承受动作影响的对象。这些元素在汉语意合、强空间性的习语结构中常被隐去，但在英译过程中，由于英语形合、重逻辑主客体关系的特点，往往需要被显化(explicitation)处理。

3.2. 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研究提出以下三个具体问题：

- 1) 在莫言小说使用的汉语习语中，潜隐施事义与潜隐受事义的分布与表现形式有何特征？
- 2) 在葛浩文的英译过程中，这些潜隐元素通过哪些具体的认知操作与语言手段得以显化？其显化策略是否存在规律性？

3) 这种从潜隐到显化的认知转换, 如何反映并印证了汉英习语语义认知机制的根本差异?

3.3. 研究方法

研究设计遵循“语料建构 - 操作规范 - 质量检验 - 价值判定”的递进逻辑, 力求在样本代表性、编码客观性和解释信度之间达成平衡, 使研究结论具备可验证性和可推广性。

3.3.1. 语料选取

本研究采用分层目的性抽样方法构建汉英平行习语语料库, 具体方案如下:

1) 文本选择。从莫言小说中选取三部代表性作品作为语料来源: 《红高粱家族》(2012) [10]、《生死疲劳》(2012) [11]及《变》(2012) [12]。对应英译本分别为 Howard Goldblatt 译 Red Sorghum (2003) [13]、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2008) [14]及 Change (2012) [15]。选择这三部作品的理据在于其涵盖莫言不同创作时期, 习语使用频率高且类型丰富, 且均有完整的葛浩文英译本可供对照分析。

2) 习语识别标准。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及《中国成语大辞典》(2013)的收录标准, 识别符合以下特征的语言单位: ① 结构相对固定; ② 具有整体性意义; ③ 包含成语(四字格固定短语)、惯用语(口语化定型短语)、俗语(民间流传的通俗语句)、谚语(总结经验的格言)及歇后语(含隐喻或谐音的两段式表达)五种类型。对于边界模糊的表达, 由两位具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背景的研究助理进行独立判定, 一致性达到 92.3% (Cohen's Kappa = 0.89), 分歧案例通过讨论解决。

3) 抽样方法。由于完全穷尽性收集工作量巨大且可能包含大量重复实例, 本研究采用配额抽样法: 首先通过完整阅读三部小说初步统计各类习语的总体分布比例(成语约占 48%, 惯用语 20%, 俗语 17%, 谚语 10%, 歇后语 5%), 然后按此比例从每部小说中随机抽取习语实例, 最终形成 240 个样本的语料库, 其中成语 120 例, 惯用语 45 例, 俗语 38 例, 谚语 22 例, 歇后语 15 例, 确保样本结构与总体分布基本一致。抽样过程中对每个习语标注其出现的作品、章节及页码, 以保证可追溯性。

4) 可复现性保障。所有 240 个习语实例及其出处信息、英译文本已整理成电子数据库(可应审稿要求提供), 包含字段: 习语原文、习语类型、出处(作品名 + 页码)、上下文、英译文本、译本出处, 以便其他研究者复现或扩展本研究。

3.3.2. 分析流程

1) 在汉语习语中识别可能存在潜隐施事或受事义的实例, 以该习语的整体语义理解是否依赖于一个未在字面出现的动作发出者或承受者为判断标准。

2) 比对葛浩文译文, 观察译者如何处理这些隐性元素, 标注显化手段,

如补充主语/宾语、使用被动语态、增加介词短语、选用已包含施受事关系的英语习语进行套译等。

3) 对显化现象进行归类与定量统计, 计算各类习语中潜隐元素的出现频率及各类显化策略的使用分布。

4) 结合心理空间映射理论, 对典型译例进行认知过程逆向推导, 描述从源语空间到整合空间再到译语空间的映射与完善操作。

其中, 为减少流程(1)识别“潜隐元素”时的主观性, 本研究制定了如下编码指南: ① 替换测试。若将习语插入完整句子时, 需要补充主语或宾语才能使句子语义完整且符合英语语法, 则该主语或宾语视为潜隐施事义或受事义。② 语义完整性测试。若理解习语的核心语义必须推断出某个动作的发出者(施事)或承受者(受事), 但该角色未在字面出现, 则判定为潜隐元素。③ 对比测试。将汉语习语与其英译文对照, 若译文中显性添加了主语、宾语、被动标记或逻辑连词, 而这些成分在原文中缺失, 则原文存在相应的潜隐元素。

最小反例(用于排除误判)如下: 反例①: “马到成功”: 虽字面无施事义, 但整体作为祝福语使用时, 其语义焦点在“成功”这一结果状态, 而非某个具体施事的行为, 因此不标注为含潜隐施事义。反例②: “风平浪静”: 描述自然状态的成语, 无动作发出者或承受者, 不涉及施受关系, 不标注为含潜隐元素。反例③: “一心一意”: 程度/方式类副词性成语, 修饰动作而非描述动作本身, 不标注为含潜隐元素。

标注一致性: 两位标注员依据上述指南独立标注全部 240 个样本, 初次一致率为 89.6%, 经讨论后达成 100% 一致。

3.3.3. 标注信度检验

为确保“潜隐/显性”标签及显化策略分类的有效性, 本研究实施了以下信度检验:

1) 标注员间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由两名标注员(均为翻译专业高年级学生及 2 年以上翻译实践经验)依据编码指南独立完成全部 240 个样本的标注, 包括: ① 是否含潜隐元素(二分类); ② 潜隐元素类型(施事义/受事义/逻辑关系/多重); ③ 显化策略类别(A/B/C/D/E/未显化)。采用 Cohen's Kappa 系数评估一致性, 结果显示: 潜隐元素识别 $K = 0.89$ ($p < 0.001$, 几乎完全一致), 显化策略分类 $K = 0.85$ ($p < 0.001$, 高度一致)。对于不一致案例(26 例, 占 10.8%), 两名标注员与第一作者共同讨论并参照编码指南达成最终共识。

2) 重测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 间隔四周后, 第一标注员对随机抽取的 60 个样本(占总样本 25%)进行重新标注, 与初次标注的一致率达 93.3% (Cohen's Kappa = 0.90), 表明标注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3) 效度验证(Validity Verification): 为验证显化策略分类的构念效度, 研究者邀请一名未参与标注的翻译学副教授对 30 个随机样本的策略分类进行专家评估, 专家评估与标注结果的一致率为 86.7%, 差异主要集中在策略 C 与策略 A 的边界(如“补充主语 + 添加介词”的复合情况), 经明确以主要操作为准的原则后, 达成一致。

上述信度检验结果表明, 本研究的标注体系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3.3.4. 评价标准

分析以描述和解释认知转换过程为目标, 采用定性判断与语境适切性检验相结合的方式评价。重点考察显化是否成功传达了原文的语义内容和认知图式, 即在心理空间映射过程中, 源语空间中潜隐的施事义、受事义及逻辑关系等认知元素是否被准确识别、完整投射并有效重构; 同时考察显化方式是否符合英语表达规范与语境需求, 包括补充的主语、宾语或连接成分是否自然地嵌入目标语句法结构, 是否与上下文保持语义连贯, 是否满足英语读者的认知期待与阅读习惯。评价过程中综合考虑译文的信息完整性、结构合理性、语用得体的性及读者可接受度, 力求在忠实性与可读性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4. 结果与分析

研究结果呈现采用“宏观数据→微观机制”的递进式结构, 先借助统计数据从整体层面勾勒显化现象的分布态势与规律性特征, 建立量化认知基础, 再通过精选的典型译例进行个案式深入剖析, 细致追踪认知转换的动态过程、策略选择的触发条件及语义重构的操作细节, 使数据归纳与理论阐释形成相互印证的解释闭环。

4.1. 定量数据：潜隐元素的分布与显化策略

通过对语料库中筛选出的包含潜隐施事义或受事义的习语实例进行分析, 可获得其在不同习语类型中的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习语类型及潜隐元素分布

习语类型	考察总数	含潜隐元素实例数	占比(%)
成语	120	87	72.5
惯用语	45	32	71.1
俗语	38	25	65.8
谚语	22	14	63.6
歇后语	15	9	60.0
总计	240	167	69.6

为检验不同习语类型中潜隐元素分布的差异性, 本研究采用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五种习语类型在是否含潜隐元素上的分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chi^2 = 2.14$, $df = 4$, $p = 0.71 > 0.05$), 表明潜隐元素在各类习语中具有普遍性。

关于显化程度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将“显化程度”操作化为三级量表: 0 = 未显化(10 例), 1 = 部分显化(仅显化部分隐性元素或采用隐含式显化如套译, 共 73 例), 2 = 完全显化(所有隐性元素均通过补充名词/代词、被动语态或介词/连词等方式显性表达, 共 84 例)。将“文化负载”依据 Aixelá (1996)的文化专有项(culture-specific items)理论分为三级: 高(含历史

典故、地域特色的成语/谚语，如“围魏救赵”，中(含一般文化意象的惯用语/俗语，如“马靠雕鞍”)，低(文化中性或具跨文化共性的表达，如“杀人眨眨眼”)。由两名标注员独立评定文化负载等级，一致性达 88.0% (Cohen's Kappa = 0.84)，分歧通过讨论解决。

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检验显化程度与各因素的关系，结果如下：

1) 习语类型与显化程度：成语的显化程度($M = 1.68, SD = 0.52$)显著高于歇后语($M = 1.33, SD = 0.62$)， $r_s = 0.19, p = 0.004$ ，效应量为小到中等。

2) 文化负载与显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r_s = 0.34, p < 0.001, 95\% CI [0.22, 0.45]$)，文化负载越高，显化程度越高，效应量为中等，这可能是由于高文化负载习语需要更多语境补充以确保目标语读者理解。

3) 叙事语境(操作化为：对话 vs.叙述 vs.心理描写)与显化程度：方差分析显示三种语境下显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F(2,164) = 5.67, p = 0.004, \eta^2 = 0.065$)，事后检验表明对话中的显化程度($M = 1.82$)显著高于心理描写($M = 1.48, p = 0.003$)，这可能与对话需要明确主体有关。

综上，显化程度与习语类型、文化负载及叙事语境均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性，支持了本研究关于显化策略受多重因素动态调节的论断。

表 2 进一步对显化策略进行了分类统计。

表 2. 显化策略及心理空间操作

显化策略类别	实例数	占比(%)	认知操作关键描述
A. 补充施事义或受事义名词/代词	68	43.3	在整合空间中完善隐性参与者，投射为英语句法主语或宾语。
B. 使用被动语态显化受事	41	26.1	将隐性被动语义(潜隐受事为主语)通过英语被动式显性表征。
C. 增加介词/连词指明关系	29	18.5	通过添加“for”，“by”，“when”等，显化动作与参与者间的逻辑关系。
D. 选用含对应关系的英语习语套译	12	7.6	映射至目标语空间中认知图式对应的习语，其自身形式已包含完整主客体。
E. 释义法整合显化	7	4.5	放弃字面映射，在整合空间进行语义重组，新表述必然包含显性主客体。
总计	157	100.0	

为进一步阐明显化策略的认知理论基础，现将每种策略类型与心理空间理论的核心操作进行明确映射[9]：

策略 A (补充施事义或受事义)对应心理空间的“完善”(completion)操作。诊断线索：译文中出现了原文字面未涵盖的名词性成分(如 humans, people, me, someone)且该成分承担主语或宾语的核心论元角色。认知机制：译者在

整合空间中激活背景框架知识，将源语空间中因高语境而省略的参与者角色显性投射至目标语空间，以满足英语论元结构的完整性要求。此操作体现了从“场景依赖”到“语言显性编码”的认知转换。

策略 B (使用被动语态)对应“重新配置”(reconfiguration)操作，即改变语法视角。诊断线索：译文使用“be + past participle”结构，且该被动主语对应原文中的受事论元，而原文无被动标记词“被”。认知机制：汉语习语常采用“受事-动词”的话题-述题结构，隐含被动语义；英译时需通过语态转换，将整合空间中的受事角色配置为句法主语，并通过被动形态显性标记其受动性质，这是一种典型的“视角-焦点”重构操作。

策略 C (增加介词/连词)对应“关系显化”(relation elaboration)操作。诊断线索：译文中出现原文未包含的功能词，如 for (受益)，by (施事) when/if (时间/条件)，because (因果)等，且这些词明确标记了事件参与者或命题间的语义关系。认知机制：汉语意合特性允许语义关系通过并置和语序隐含，译者需在整合空间中将这些隐性的概念关系通过目标语的语法化手段显性表征，使英语读者能沿明确的逻辑路径进行顺序扫描式理解。

策略 D (套译)对应“跨空间类比映射”(analogical mapping)。诊断线索：源语习语与目标语习语在字面形式上可能完全不同，但在图式结构或概念隐喻层面高度对应，且目标语习语自身已编码完整的论元关系。认知机制：译者在两个输入空间之间建立深层的结构对应关系，跳过逐字映射，直接激活目标语中认知等效的习语框架，该框架本身包含显性的主客体关系，从而“继承式”完成显化，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整合操作。

策略 E (释义)对应“解构-重构”(decomposition-reconstruction)的综合操作。诊断线索：译文放弃了源语习语的字面意象和结构，改用多词组或完整句子重新描述其核心语义，必然包含完整的论元和关系标记。认知机制：译者将源语空间中的压缩性整体图式解构为基本语义单元，在整合空间中依据目标语的认知习惯和句法规范重新组合，生成全新的语言表征，所有原本潜隐的角色和关系在重构过程中被迫显性化，这是最彻底的认知转换模式。

上述映射关系表明，表面上的显化策略差异，本质上反映了译者在不同情境下选择不同认知操作路径的决策，而所有路径均指向同一目标：将汉语“压缩-隐含”的认知模式转换为英语“展开-显性”的语言表征。

4.2. 定性分析：潜隐元素的类型与显化过程

本部分将依据潜隐元素的语义属性对其显化路径作分类考察，并以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译例为线索展开认知层面的细读与对照分析，从而更清晰地揭示不同语义角色在心理空间映射中的激活条件、推演链条与表征转换规律，同时为后文的类型归纳与机制讨论奠定解释框架。

4.2.1. 潜隐施事义的显化

汉语习语，尤其是四字成语和惯用语，常以无主句或泛称主语形式出现，具体施事义需从上下文推断。在翻译中，译者必须将这一隐含施事义在整合空间中“完善”，并投射至英语句子中通常不可或缺的语法主语位置。

例 1: 人凭衣衫, 马靠雕鞍。(《红高粱家族》, 2012: 173) (谚语)

译文: Humans need nice clothes, horses require a fine saddle. (Goldblatt, 2003: 191)

认知过程分析: 源语空间输入了一个对比性的经验图式, 两个分句均省略了泛指的施事义(“人们”、“马匹”)。在跨空间映射时, 源语空间中的隐性施事“人”和“马”被识别并投射至整合空间。在完善阶段, 根据英语“主谓”结构的强制要求, 这些施事义被显化并确立为句子的主语“Humans”和“horses”。同时, 隐含的动作关系“凭”、“靠”被具体化为“need”和“require”, 其受事义“衣衫”、“雕鞍”则被显化为“nice clothes”和“a fine saddle”。整个转换清晰展示了从汉语意合性并列短语到英语形合性主谓句的认知重构。译者在整合空间中不仅补充了主语, 还选择了能够准确传达依赖关系的动词, 使原本凝练的谚语在英语中展开为逻辑清晰的对比句式, 实现了从潜隐到显化的成功转换。

4.2.2. 潜隐受事义及被动语义的显化

汉语习语中, 受事义常作为话题或隐含成分出现, 被动语义也常无需“被”字标记。英译时, 常需将隐性受事义提升至主语位置并用被动语态, 或补充出受事义宾语。

例 2: 千里姻缘一线穿。(《生死疲劳》, 2012: 451) (歇后语)

译文: People fated to be together are connected by an invisible thread. (Goldblatt, 2008: 28)

认知过程分析: 源语空间呈现了一个浪漫的因果图式: 遥远的姻缘被一条线贯穿。其中, “姻缘”是受事义, “穿”的动作隐含了一个超自然的施事义(如“命运”)。在映射与整合过程中, 译者将“姻缘”具体化为“People fated to be together”(被命运安排在一起的人们), 并将其确立为整合空间的核心参与者。动作“穿”被映射为“are connected”, 并以被动语态呈现, 巧妙地规避了补充一个可能显得突兀的超自然施事义(如“fate”), 同时用“by an invisible thread”保留了“一线”的工具角色。此例完美展示了如何将汉语中主动形式但隐含被动关系的表达, 通过被动语态将潜隐受事显化为主语。译者的处理充分考虑了英语读者的认知习惯, 通过被动结构将焦点置于“人们被连接”这一状态, 而非强调“谁在连接”, 既符合原文的浪漫意境, 又满足了英语对受事主语的偏好。

例 3: 杀人不眨眼。(《红高粱家族》, 2012: 119) (惯用语)

译文: ...who could kill without batting an eye. (Goldblatt, 2003: 139)

认知过程分析: 此例代表了另一种处理方式。汉语“杀人不眨眼”字面上“人”是受事义, 但整个结构描述的是施事义(杀手)的特性。源语空间的图式焦点在施事义的冷酷, 受事义“人”是泛指的、融合在动作中的。译者并未将“人”显化为“kill people”, 而是直接映射到英语习语“kill without batting an eye”。在目标语心理空间中, 该习语作为一个固化的构式, 其受事义同样是隐含的、泛指的。这是通过策略 D (套译)实现的认知对接, 源语与目标语的习语在认知图式层面高度对应, 使得潜隐的受事义在两种语言中得以保持

相似的隐现状态，避免了不必要的显化。这反过来说明了显化并非绝对，当认知图式高度匹配时，隐性可以得以保留。译者精准把握了两个习语在表达“冷酷无情”这一抽象概念上的共性，通过套译实现了意义传递与形式经济性的双重目标。

4.2.3. 潜隐动词与连词关系的显化

战海英(2025)指出的隐性动词与连词元素，在翻译中也常需显化，以构建英语所需的完整句法框架[5]，这间接影响了施事 - 受事关系的明晰化。

例 4: 买卖不成仁义在。(《红高粱家族》，2012: 24) (俗语)

译文: Even if you can't agree, you mustn't abandon justice and honour. (Goldblatt, 2003: 29)

认知过程分析：源语空间呈现了一个商业伦理的劝诫图式，包含两个并列的事态：“买卖不成”与“仁义在”。汉语通过语义对比和并置直接传达了让步 - 转折的逻辑关系，无需连词标记。“买卖不成”中隐含了施事义(交易双方)，“成”为动词，“仁义”中“在”也是动词，但整体关系依靠意合呈现。在映射至整合空间时，译者识别出这一隐性的让步逻辑，通过添加让步连词“Even if”将其显化。同时，补充了泛指施事义“you”，并将“买卖不成”转化为“can't agree”(不能达成一致)，使施事义和动作均显性化。“仁义在”被转化为“mustn't abandon justice and honour”(不能抛弃正义和荣誉)，通过情态动词“mustn't”和动词“abandon”的组合，将原本名词性的“仁义”转化为动作客体，使整个句子在英语中形成完整的“施事 - 情态 - 动作 - 受事”结构。这一显化过程不仅补充了隐性的主语和连词，还对动词结构进行了重构，充分体现了英语形合语言对逻辑关系和句法完整性的要求。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不同类型习语中潜隐元素的显化模式，我们选取五类习语的典型范例进行细化对比(见表 3)。

表 3. 显化认知机制典型范例

习语类型	汉语原文及出处	葛浩文译文	潜隐元素类型	显化策略	认知转换关键点
成语	围魏救赵之计 (《红高粱家族》，2012: 184)	the classic “Encircle the Wei to rescue the Zhao” ploy (Goldblatt, 2003: 211)	潜隐施事义 (实施计策者)	A (补充名词 ploy 作为受事，施事由语境主语承担)	将抽象“计”具体化为可执行的“策略” ploy，使动作“用计”的潜在施受关系具体化。
惯用语	心惊胆战，疑神疑鬼(《变》，2012: 428)	nearly had me quaking in my boots, scared of what might happen next (Goldblatt, 2012: 43)	潜隐施事义 (我)、潜隐受事义 (恐惧对象)	A (补充“me”), E (释义整合, “scared of...” 补出恐惧对象)	通过增加体验者 me 及恐惧原因从句，将描述状态的短语重构为包含完整经验者与刺激物的心理事件句。
俗语	买卖不成仁义在 (《红高粱家族》，2012: 24)	Even if you can't agree, you mustn't abandon justice and honour (Goldblatt, 2003: 29)	潜隐施事义 (交易双方)、潜隐连词 (转折)	A (补充“you”), C (增加连词 “Even if”)	补充泛指施事 you，并显化隐含的让步关系，使劝诫的逻辑关系清晰，符合英语论述习惯。

续表

谚语	人心齐，泰山移 (《红高粱家族》， 2012: 167)	A people united in spirit can move Mount Tai (Goldblatt, 2003: 193)	潜隐施事义 (人们)、潜隐 条件关系	A (补充 “a people”), C (结构上 隐含条件)	将主题性名词短语“人心 齐”转化为带有施事义 a peo- ple 及修饰语 united in spirit 的从句，作为主句 can move...的前提。
歇后语	高射炮打蚊子 大材小用(《变》， 2012: 432)	That would be like shooting down a mosquito with a canon. (Goldblatt, 2012: 54)	潜隐施事义 (行为者)、 潜隐比较主体	A (补充 “That” 指代前文情境 作为比较主体)	补充比较主体 That，使整个 比喻结构完整。潜隐施事在 比喻句 shooting...中仍是泛指 的，符合英语比喻句习惯。

表 3 综合展示了五类习语中潜隐元素的多样性与葛浩文显化策略的灵活性。从成语到歇后语，虽然潜隐元素的具体表现各异，即有的是缺失的施事义，有的是隐含的逻辑关系，有的是未明确的受事义，但译者都能够根据不同习语的认知图式特点，在整合空间中进行针对性的完善操作。以成语“围魏救赵之计”为例，译者保留了异化的音译核心，但通过添加“ploy”这一英语名词，使“计”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为可操作的策划行为，潜在的施事义(使用此计者)和受事义(敌方)虽未直接显化，但通过“ploy”的语义框架被激活。惯用语“心惊胆战，疑神疑鬼”通过释义法进行了彻底的认知重构，将描述心理状态的四字短语转化为包含体验者“me”、心理活动“quaking”和恐惧对象“what might happen next”的完整心理事件，所有潜隐元素均得到显化。俗语和谚语的显化则侧重于逻辑关系的明晰和施事主体的补充。歇后语的显化最为巧妙，通过补充指示代词“That”将前文情境作为比喻的本体引入，使歇后语的比喻结构在英语中得以完整呈现。这些范例充分说明，无论潜隐的是施事义、受事义还是逻辑关系，译者都能够通过在整合空间中完善认知图式，并将其适配于英语的句法-语义框架中，从而实现从潜隐到显化的顺利过渡。

5. 发现与讨论

基于上述量化统计与定性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三点核心发现。

发现一：汉语习语潜隐元素的普遍性根植于汉民族的强空间性思维与意合语法，这构成翻译中认知转换的逻辑起点与内在动因。

本研究语料库中近 70%的习语样本含有潜隐施事或受事义，这一高比例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汉语认知模式的必然产物。它印证了战海英(2025)关于汉语习语始源域常含隐性元素的理论论断[5]，同时也与王文斌、赵轶哲(2021)关于汉语强空间性表征的研究形成呼应[16]。汉语的强空间性特质允许语义成分以块状并置，通过语义关联和语序直接组合，无需显性的形态标记来连接主客体。这种认知模式使得汉语习语能够以极简形式承载高密度的认知信息。如“围魏救赵”四字浓缩了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图式，施事义(孙臆或齐军)、受事义(魏军、赵国)以及复杂的战略意图均隐含在并列的动词短语结构中。这种“意合”特性(袁毓林等，2014)将厘清逻辑关系的任务交给了读者(或译者)的认知补足[17]。

更深层次而言,这种潜隐现象反映了汉民族整体性思维的特征。整体性思维注重事物间的联系与统一性,作用于认知机制,致使某些元素在表层被隐去,但在深层认知中仍保持激活状态。汉语习语的使用者依赖高语境(high-context)的文化共识和情境线索,能够自动补全这些隐性元素。然而,当习语进入跨语际的翻译场景,这种基于共享文化背景的默契被打破,译者必须首先识别出源语心理空间中这些被“打包”的、潜隐的语义角色和关系,然后进行解包与重构。这是整个认知转换过程的必要前提,也决定了显化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回避的操作。因此,潜隐元素的普遍性不仅是汉语习语的结构特征,更是汉英翻译中认知转换的逻辑起点,它要求译者具备深刻的双语认知能力和文化敏感度。

发现二:显化策略构成一个从“结构摹写”到“认知重构”的连续统,译者根据习语的文化负载度、结构固化程度及叙事语境进行动态选择,体现了翻译中显化与归化、忠实与可读之间的辩证平衡。

表 2 的数据显示,葛浩文采用的显化策略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呈现出从直接对应到深度重构的多层次分布。补充名词/代词(43.3%)和使用被动语态(26.1%)属于相对直接的“结构摹写”型显化,即在尽量保持原文意象和字面结构的同时,通过调整句法成分的位置或形态来满足英语的形合要求。这种策略在翻译文化负载高、意象独特的习语时尤为常见。单伟龙(2017)指出,葛浩文在处理《红高粱家族》和《变》中的习语时,倾向于以直译为主,异化为先,本研究的发现与此相符[1]。如将“人心齐”译为“a people united in spirit”,是通过添加关系从句将隐含的“状态”转化为显性的“修饰”,施事义得以确立,但整体意象“人心”与“团结精神”的对应关系得到保留,体现了异化策略下的显化操作。

而套译(7.6%)和释义(4.5%)则更接近“认知重构”的极端,译者更关注源语与目标语习语在整体认知图式上的对等,有时会牺牲字面形式以追求深层语义和文化联想的匹配。朱琳与马莉(2024)的研究发现,葛浩文对俗语、典故等文化背景要求相对较低的习语,归化策略占比更高,异归结合法的使用也更为频繁[2]。这与本研究的发现一致:当习语的文化特异性较弱,或在目标语中存在高度对应的表达时,译者倾向于选用套译或释义,通过激活目标语读者熟悉的认知图式来实现等效传递。如用“kill without batting an eye”译“杀人不眨眼”,虽未显化“人”,但通过激活“冷酷杀戮”的相同概念隐喻,实现了认知层面的等效。

这种策略选择的灵活性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文化负载高、意象独特的习语更倾向于采用结构摹写型显化(策略 A、B),以保留文化异质性。而在对话或需要快速传递核心含义的叙事环节,译者可能更倾向于选用释义法(E)或套译法(D)以确保可读性。此外,习语在原文中的语篇功能也影响显化程度:若习语主要起修辞装饰作用,译者可能更自由地进行重构;若习语承载关键情节信息,则更倾向于忠实显化所有语义成分。这表明,显化不仅是一种语言层面的强制适应,更是译者主体性介入下,在“异质”保留与读者接受之间、在形式对等与认知对等之间进行权衡的认知决策过程(刘云虹等, 2014)[18]。葛浩文的翻译实践展现了对这种复杂平衡的精准把握,使得译本既保留

了大量中国文化意象，又能保持高度的可读性。

发现三：从潜隐到显化的转换，本质上是将汉语“整体扫描”的认知模式适配于英语“顺序扫描”的语言表征系统的过程，这一深层认知差异决定了显化的必然性与操作方式的多样性。

这一发现将微观的翻译操作与宏观的认知类型差异联系起来，揭示了显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机制。汉语习语的语义建构倾向于“整体扫描”，即同时激活所有成分并把握其整体关系，潜隐的元素在并置的结构中可通过整体领悟而补足。而英语句子则遵循“顺序扫描”，强调动作与状态按时间或逻辑顺序依次展开，其句法框架强制要求各参与者角色(施事义、受事义等)及相互关系(连词、介词标记)在线性序列中得到明确表征(Langacker, 1988) [19]。这种认知模式的根本差异，决定了汉语习语中的潜隐元素在英译时必须被显化。

葛浩文的翻译实践清晰地体现了这一适配过程。他将“千里姻缘一线穿”这一整体呈现的意象，转换为按逻辑顺序展开的“People... are connected by... thread”；将“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一并列的警句，转换为带有显性让步关系的“Even if..., you mustn't...”。这种转换不仅是语言的，更是认知模式的：译者充当了认知中介，将源语读者通过整体扫描领悟的、包含潜隐关系的心理空间，重新编码为目标语读者可通过顺序扫描理解的、关系显化的心理空间。这一过程成功的关键在于，译者精准把握了两种语言认知机制差异的核心，并能在整合空间中创造性构建出既能承载原文认知内容、又符合目标语认知习惯的新颖结构。

更进一步，这种适配过程反映了两种语言在信息包装上的不同偏好。汉语倾向于将信息压缩在紧凑的结构中，通过空间关系和语义共鸣传达复杂内涵；英语则倾向于将信息展开在线性序列中，通过显性标记指引读者的认知路径。显化操作正是将压缩的信息解包并重新排列为线性序列的过程。这也解释了为何葛浩文的译本在保留大量中国文化意象的同时，仍能保持高度的可读性。他通过精细的显化操作，为英语读者搭建了解汉语独特认知模式的桥梁，使跨语际的认知迁移成为可能。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对汉英翻译认知机制的理解，也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6. 结语

本研究以心理空间映射理论为框架，深入考察了莫言小说中汉语习语英译时潜隐施事义与受事义的显化现象。通过对自建语料库的定量与定性分析，揭示了汉语习语中潜隐元素的普遍性及其认知根源，系统描述了葛浩文所采用的各种显化策略及其背后的认知操作，并最终将这一微观的翻译转换过程，归结为汉英两种语言在认知模式上的深层适配。研究发现，显化并非简单的语言添加，而是一个涉及识别、映射、整合与完善的动态认知重构过程，译者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认知中介作用。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汉英习语本质差异与翻译认知机理的理解，为文学翻译的认知研究提供了具体案例。然而，本研究主要基于书面译例的静态分析，未来研究可结合有声思维报告等实证方法，更直接地追踪译者在线处理潜隐元素时的认知过程。此外，本

研究聚焦施事义与受事义，未来可扩展至其他类型的隐性元素的显化研究，以构建更全面的汉英翻译认知转换模型。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1] 单伟龙. 基于语料库的葛浩文习语翻译研究——以《红高粱家族》和《变》为个案[J]. 外语电化教学, 2017(1): 83-89.
- [2] 朱琳, 马莉. 基于语料库的葛浩文习语翻译研究——以《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J]. 现代语言学, 2024, 12(1): 373-381.
- [3] 陈建彬. 汉英习语语义形成的认知机制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0.
- [4] 黄曼, 廖美珍. 汉英习语变异构式的理据研究: 隐喻-转喻连续统新释[J]. 外语教学, 2020, 41(3): 41-46.
- [5] 战海英. 英汉习语语义认知机制的差异性研究[J]. 中国外语, 2025, 22(2): 29-35.
- [6] 吴爱荣, 菲丽娜·米吉提. 莫言小说中成语的用法分析及翻译原则——基于《酒国》和《丰乳肥臀》俄译语料的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9(6): 90-96.
- [7] 宋庆伟. 基于语料库的莫言小说英译本中国话语建构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49(5): 167-179.
- [8] 欧阳珊. 跨文化视角下葛浩文的四字成语英译策略研究——以莫言小说《生死疲劳》为例[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7(5): 153-157+172.
- [9] Fauconnier, G. and Turner, M. (2002) Blending as a Central Process of Grammar. In: Goldberg, A., Ed.,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113-129.
- [10] 莫言. 红高粱家族[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 [11] 莫言. 生死疲劳[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 [12] 莫言. 变[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 [13] Mo, Y. (2003) *Red Sorghum*.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 Arrow Books.
- [14] Mo, Y. (2008)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 Arcade Publishing.
- [15] Mo, Y. (2012) *Change*.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 Seagull Books.
- [16] 王文斌, 赵轶哲. 论超常规四字格成语与汉语强空间性表征的同质性[J]. 当代修辞学, 2021(1): 10-18.
- [17] 袁毓林, 詹卫东, 施春宏. 汉语“词库-构式互动的语法描写体系及其教学应用”[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4(2): 17-25.
- [18] 刘云虹, 许钧. 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 关于葛浩文的翻译[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 37(3): 6-17.
- [19] Langacker, R. W. (1988)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 486-487.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从潜隐到显化的认知转换机制研究 ——莫言小说习语英译的心理空间分析

摘要: 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心理空间映射理论, 探究莫言小说中汉语习语英译过程中的认知转换机制。研究聚焦于汉语习语语义建构中普遍存在的潜隐施事义与潜隐受事义, 在跨语转换中如何通过心理空间的映射、整合与完善操作实现显化。主要发现: 1) 汉语习语因其强空间性、意合特征及整体性思维, 在始源域或输入空间中高频存在施受事隐性元素; 2) 英译显化策略呈现连续统分布, 具体手段包括补充隐性施事义/受事义、将隐性被动语义显性化、增加连词或动词元素以完善句法框架; 3) 显化程度与习语类型、文化负载度及叙事语境存在显著相关性, 译者通过动态平衡“异质”保留与读者接受, 完成从潜隐到显化的认知转换。

关键词: 汉英习语, 认知机制, 心理空间, 语义显化, 潜隐施事/受事义